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走向历史的深处

马克思历史观研究

陈先达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向历史的深处: 马克思历史观研究/陈先达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ISBN 978-7-300-11502-3

I. ①走…

II. ①陈…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IV. ①B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0546 号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走向历史的深处
——马克思历史观研究
陈先达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7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
字 数	417 000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人类在改造世界中探索着其中的奥秘，无论是自然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是这样。人类思想史上的许多发现，犹如夏夜的群星，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其中最明亮的一颗，是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它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揭开了长期覆盖在社会机体上的帷幕。无怪乎恩格斯于 1883 年 3 月 17 日站在生死与共的亡友墓前发表著名的悼亡演说时，突出地评价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划时代的历史功绩，誉其为马克思—生中的第一个伟大发现。

马克思主义是包括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内的统一整体。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史观确实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马克思的独创性和突出贡献。辩证法和认识论的某些原理，可以在马克思的先驱者们那里找到初始形态：古希腊就出现了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而且黑格尔在历史上第一次以唯心主义形式阐述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费尔巴哈则确立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原则。在社会领域则不同。尽管人类也进行了长期的探索，而且有某些唯物主义观点的萌芽，但从总体上说都是唯心主义的。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不像在自然领域和认识领域那样，可以通过倒转、剔除、清洗、补充来形成新的理论，而必须通过总结全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重新研究历史和现实，揭示从未被发现过的历史自身的规律。从被繁芜复杂的意识形态、动机和偶然性层层包裹的历史表层走向历史的深处，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

社会科学完全可以成为像自然科学—样精确的科学。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定性准确，即对历史的宏观规律有一个科学的理解。社会有机体不同于生物机体，它有自己特有的规律。社会中的各个系统虽然有自己的特殊结构和功能，但它们相互联系，构成一个不



可分割的整体。不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不分析社会现象的性质和复杂的因果关系，就根本不可能认识社会。但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不能停留在定性分析上，凡是有可测定量的地方应该进行定量分析。随着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的兴起，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数学方法渗入社会科学领域，为精确把握社会现象量的规定性提供了条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是一种进步趋势，哲学工作者应该面向世界，面向当代，总结科技革命的新成果。自然科学的成就，不会降低而只会更加丰富和证实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任何自然科学方法都不能取代唯物史观。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历史证明是不可取的。

梅林说：“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以最后真理为其终点的体系。”^①这个意见无疑是卓越的。唯物史观不是问题解答，它不能为复杂多变的历史提供现成的答案，但为人们找到正确的答案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无论认识历史的手段和工具怎样进步，第一次发现唯物史观，把唯心主义从历史领域驱逐出去永远是矗立在人类认识途程中的一块界碑。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他用唯物史观之光，照亮了长期在黑暗中摸索的社会历史领域。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两个人又是一个人。他们各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但又是同一种思想体系的共同创始人。恩格斯在1845年春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再度合作之前，通过自己的探索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论。本书是专门探讨马克思的，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恩格斯对创立和捍卫唯物史观作出的历史贡献。

^① [德]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导 言

人类对历史规律的探索

卢梭曾感叹过：“人类的各種知識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備的，就是關於‘人’的知識。”^① 確實如此。人類最關心的是自己，但在很長的历史時期內最不了解的也是自己。狹小的生產規模和剝削階級的偏見限制了人們的历史眼界。人們深入到自然的內部，但在社會生活中却停留在历史的表层。可是历史自身以及人們对历史的認識都不會停止。正如对自然界一樣，在社會領域中人們也在不斷地探索。馬克思創立的唯物史觀，就是人類对历史探索的最光輝的結晶。

—

人類是从自然開始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學歷程的。自然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距很近，但又很遙遠，用中國的成語“咫尺天涯”來形容是頗為恰當的。

它們距離很近，因為它們具有相同的唯物主义原則。历史唯物主义關於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論斷，同一般唯物主义關於存在決定意識的原則是一致的。似乎只要加以引申、擴充、推導，就可以跨進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門。

實際上它們的距離又很遙遠。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認識，早在古希臘就開始了。他們把物質性的始基作為宇宙萬物的根源，以最朴素的形式表達了对世界物質統一性的看法。但从自然唯物主义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荆棘叢生，崎嶇坎坷，人類经历了兩千多年的探索，這是多么艱巨遙遠的途程！

^① [法] 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62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



为什么会这样？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不是自然的简单延伸，它有其自己特殊的表现形式和规律，必须进行专门研究。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同自然唯物主义在理论原则上一致性的论断^①，从逻辑上说是完全正确的。但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以后才能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因而列宁的论断是对既成事实的概括。在此之前，这种联系是隐蔽的。两千多年中，唯物主义哲学家中并不乏聪敏才智之士，但没有一个人能从唯物主义原则中逻辑地推导出历史唯物主义结论。

在自然界中，人们看到的是物质和运动；而在社会领域，看到的是人的意志和行为。社会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在这个领域中进行活动的是有意识、有激情、怀着各自目的的人。但人们的目的并不都能产生预期的结果，它表现为一连串的偶然性，而且具体的历史事件具有不可重复的单一性。社会生活所呈现的这种主体性、单一性、随机性的特点，成为横跨在自然和社会之间的“活动翻板”。即使是比较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当他们把视线由自然转向社会，一进入到社会历史领域，几乎都是被这块活动翻板翻向了唯心主义的深渊。列宁曾经总结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指出以往一切历史理论有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一切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发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一切历史理论恰恰都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这也就是说，以往一切历史理论都停留在人们的主观动机上，而且是伟大人物的主观动机。列宁总结的以往历史理论的根本缺点，是同社会在主体意识中所呈现的表面特征相一致的。

正因为这样，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认识早于对社会的认识。如果说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曾经历唯物主义的几种形式，历史领域则不同。在唯物史观产生之前，唯心主义在这个领域中一直处于统治地位。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历史观没有发生过形态的变化，更不能说人类以往对历史的认识毫无建树，只是一连串谬误。正如同客观历史自身一样，人类对历史的认识也是进步的。

^①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只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列宁选集》，2版，第2卷，3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就与马克思关系密切的西方文化传统而言，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出现了诸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阿、毕克托、老加图、萨鲁斯特、李维、塔西佗、普鲁塔克等著名历史学家，写了关于古代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关于希腊、罗马历史的著作。他们力图保存人类已达到的成就，不致湮没无闻，而且努力探求某些历史事件的原因，这表现了人类对自身活动的兴趣和关注。就他们对历史的认识来说，不少人没有摆脱神的束缚。他们相信天命，把上帝看成是主宰国家兴亡、人世变迁、民族盛衰荣辱的最高力量。

用超自然的意志和力量来解释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神学历史观，在中世纪处于支配地位。他们把古代的某些神学历史观点发展成为一个体系。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①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都是神学历史观的积极鼓吹者，他们宣扬人间的一切秩序都是由神安排的，都决定于天意，除非得到神的帮助和启发，人永远不能全面了解有关人类自己的事情。这种神学历史观，用天意、天命、命运把历史自身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因果关系变成神学的宿命论。

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是受历史本身制约的，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逐步孕育，特别是由于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标志着从神到人的转折。他们逐步摒弃了神学历史观，把天国的历史变成世俗的历史，不是从神的意旨而是从人自身中探究历史的秘密，力图把神学的必然性变成历史的必然性，提出探讨历史的规律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被尊为“历史之父”，意大利17世纪的思想家乔·维科则被拉法格称为“历史哲学之父”。正是维科在他的《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论合理的世界秩序的统一原则》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4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著作中，提出了探求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

维科虽然没有完全摆脱神学历史观的局限，但不像他们那样直接用神的意志来解释历史。他说：“一切有思想的人都不会惊奇哲学家曾努力试图认识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而这个认识本来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相反地却轻视社会界的研究，这个认识人是可以达到的，因为社会是人创造的。”^① 神创造了自然界，也只有神才能认识自然界；社会领域不同，社会是人创造的，也是人能认识的。维科关于自然和社会区分的观点当然是不科学的，但他强调人能认识自己创造的社会，这同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的神学历史观的传统是不同的。

维科的一个巨大功绩在于，他强调了历史规律的共同性。人类历史尽管纷纭复杂，但不管他们的种族起源和地理环境如何，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一切民族在各个时代都要经历的过程。他说：“有一个理想的永久的历史存在着，一切民族的历史总是要通过它的，他们不论是从野蛮、半开化还是从粗野状态出发，总是要达到文明。”^② 正因为维科排除神对历史的干预，他强调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维科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并没有达到唯物主义的理解。他没有能力从社会自身寻找它的内在规律，而是采用同人类个体发育相类比的方法提出他的社会发展理论。正如任何个体发育都经历童年、青年、成年一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经历同样的过程。人类社会的童年是神的时代，这时没有国家，服从祭司，完全受宗教观念的统治；人类社会的青年是英雄时代，这是贵族统治的时代；而人类社会的成年则是凡人时代，这是民主共和国或保障资产阶级自由的代议制君主国家的时代。维科的政治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把凡人时代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完全是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作论证的。但维科既然按照个体发育进程来描绘历史必定陷入困境：或者人类社会像人类个体一样，在经历了童年、青年、成年之后走向死亡；或者每一代人又重新开始自己的生命历程，这样周而复始，构成生命不断的洪流。维科选择后者，认为人类社会在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之后，又重新开始同样的进程，这样人类历史便陷入了循环，在封闭的圆圈里来回倒腾。

^① [意] 维科：《新科学原理》，转引自 [法]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2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② 同上书，21页。



法国启蒙学派又前进一步，他们深入到人与环境相互关系问题的探讨。人类借以生存的环境分两类：一是自然环境，另一是社会环境。认识的顺序是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开始的。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试图从人类社会都不可缺少的自然环境中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他在《论法的精神》序言中说，他的任务不在于非难各国存在的各种制度，而在于阐明它们。尽管社会法规是各种各样的，但它们既不是纯粹偶然的，也不是取决于专断行为，而是有其共同规律的。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是共同原则的个别表现，研究者的任务就在于探求这些共同原则。

其中一条共同性的原则，就是各种不同的国家制度、法律形式决定于人类社会所依存的自然环境，诸如气候、地理形势、土壤等。孟德斯鸠非常重视气候，他认为寒冷的气候造就健康和勇敢的人，炎热的气候则造就软弱和怯懦的人；南方民族常常沦为奴隶，而北方民族则能够保护自己的自由。因此孟德斯鸠认为，奴役制度同气候性质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一些国家实行专制制度、多妻制度、奴役妇女的制度，而另一些国家实行共和制、一夫一妻制，这都是由气候决定的。即使是宗教信仰也取决于气候，不适合本国气候的宗教，在本国是不能维持下去的。佛教之所以产生于印度，原因在于这里气候炎热。过度炎热的气候使人萎靡疲惫，趋向于静净无为。

孟德斯鸠还认为，国家制度决定于地理形势即领土的大小。狭小的领土适宜共和制，大小适中的领土适宜君主制，广袤的领土则适宜专制制度。亚洲幅员辽阔的领土，成为建立庞大专制帝国的前提。孟德斯鸠用领土规模来解释当时欧亚国家形式的差别。欧洲由于其天然领土的划分，形成了一些不大不小的基于法治的君主制国家，如果改变了这种国家形式，则它们必然趋于衰败；反之，亚洲辽阔的天然领土则适宜建立庞大的专制帝国，如果把统一的帝国分割为一些较小的单位，则必然与国家的天然领土划分相矛盾。

孟德斯鸠还强调社会制度对土壤的依赖关系。在他看来，不种土地的民族比农业民族享有更大的自由，因为土壤适宜种植的民族专注于农业，不关心自己的自由。而且从军事角度说，肥沃的地方易攻难守。不适宜农业的多山国家，易于防守，而且也不会成为征服的目标。土壤贫瘠，迫使人们进行艰苦劳动，培养他们勇敢耐战的精神。得到自然恩赐，能从自然界中获得一切的民族，则使人柔弱、懒惰、怯懦。而且土壤条件不同，政权形式也不同：居住山地



的人坚决主张平民统治，平原上的人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

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生产力水平很低，这种影响尤其明显。但地理环境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一些曾经创造了高度文明的民族没落了，而另一些落后的民族和地区，后来又站在了历史发展的前列。它们各自的地理环境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改变缓慢的地理环境，不能成为社会迅速变化的原因，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必然会迫使人们把视线从外部环境转向人类社会自身。

法国唯物主义完成了这一步，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进到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们不是从土壤、气候、地形等外部因素，而是从人的意见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探讨社会的发展。例如爱尔维修反对笛卡儿的天赋观念，彻底发挥洛克的唯物主义原则，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一切都是社会环境的结果。可是爱尔维修并不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他把社会环境看成是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认为各族人民的性格和智慧随着政府形式的改变而变化；即使同一个民族，它们之所以有时崇高，有时低劣，有时稳定，有时变化，有时勇敢，有时胆怯，原因在于政府的形式不同。因此当爱尔维修解释为什么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社会环境时，他又回到人自身，从人的主观意见中寻找社会环境的决定因素。在他看来，只要有真正天才的立法者，就能制定出好的法律，从而创立一个好的政府，而无知产生的是有缺点的法律，有缺点的法律造成恶习的发展并引起社会灾难。

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论断显然是矛盾的，但这种矛盾，同说水在鲸上鲸在水上的矛盾不一样。法国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中所包含的这种矛盾，不是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而是表现人们积极探索所碰到的一种理论矛盾。要走出这种相互论证的困境，必须进一步探索。

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基佐、梯叶里、米涅表现出某种摆脱这种矛盾的倾向，他们试图走出相互作用的圈子，把着眼点开始移向环境的方面。基佐在《法国史概论》中说：“大部分著作家、学者、历史学家或政论家企图以某一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解释这个社会的特定的状态，它的文明的程度或种类。假如从研究社会本身开始，以便认识和理解它的政治制度，这将更加聪明些。制度在成为原因



之前，先是结果；社会先创造它们，然后在它们影响之下开始变化；不要按照政府的形式来判断人民的状况，而应该首先研究人民的状况以便判断它的政府应该怎样和能够怎样。”基佐还据此提出来：“社会，它的成分，按其社会地位而不同的各个人的生活式样，各人不同的阶级关系——总之人们的公民生活——无疑地，这是希望知道各民族过去如何生活的历史学家及希望知道他们过去如何被统治的政论家所应首先注意的第一个问题。”^①

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观有两点突破性的意见：第一，他们已不像法国唯物主义那样从人的意见中寻找政治制度的依据，而是用财产关系来解释政治制度。例如基佐就是根据上面提到的原则研究西罗马灭亡后出现的状况，认为要研究这段历史，理解它们的政治制度，应该研究社会中不同阶层及其相互关系；而要知道这些不同阶层及其相互关系，必须研究土地关系的性质。第二，他们已经看到了阶级斗争，基佐、梯叶里、米涅对英国和法国历史的研究，都透过各种宗教斗争和党派斗争，看到了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阶级斗争。

但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并没有达到唯物史观。它向前迈进了一步，提出把财产关系作为政治制度的依据，从而走出了环境与人的意见相互作用的圈圈，但并没有最终解决这个矛盾。当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企图回答财产关系的起源，回答为什么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财产关系，它又援引人性来作为答案。这样，它虽然迈出了环境与意见这个小圈子，但仍停留在用人性来解释历史这个大圈子里面。普列汉诺夫曾正确地总结了这一点。他说：“面对着财产关系的来源问题，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们，谁大概都会如基佐一样，以或多或少机智地引用‘人的天性’来摆脱困难。”并且指出：“把‘人的天性’看做解决一切法权、道德、政治、经济领域内‘棘手事件’最高裁判者的观点，十九世纪的著作家完全是从上世纪的启蒙学者那里继承来的。”^②

历史观能否进一步发展，取决于能否突破用人性来解释历史的范式。以人性来解释历史，无疑包含着不可解决的矛盾：不变的人性怎样能成为变动不居的历史的原因呢？如果人性也是变化的，那

^① 转引自 [俄]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15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② 同上书，23 页。



人性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法国启蒙学派、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在这个泥潭里扑腾。黑格尔看到了这个矛盾，并力图解决这个矛盾。他不是在人性和之中，而是在人性之外，在他所虚构的绝对观念中寻找历史的动力，用绝对观念的自我发展来描绘历史。黑格尔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观念是卓越的。它把自维科以来开始探求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观点系统化了，但也神秘化了。人们在黑格尔关于地理环境，关于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关于恶（情欲）在历史中的作用，关于历史人物作用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到前人的影子。但只有像黑格尔这样的天才人物，才能用思辨的逻辑把它们编织在绝对观念自我发展之网中。

黑格尔把历史看成是有规律的过程。黑格尔之后所面临的问题，是走出他所设置的迷宫，把理念的规律真正变成历史自身发展的规律。这不是纯粹思维的要求，而是时代的使命。完成这个伟大历史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

二

如果没有马克思，会出现唯物史观吗？

如果马克思早出生或晚出生一个世纪，唯物史观的创立会相应提前或推迟吗？

如果……其实我们可以提出一系列“如果”，但历史面对的是既成事实，它应该是分析，而不是假设。

毫无疑问，唯物史观同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是融为一体的。马克思个人的天才智慧、崇高品德、丰富学识、穷根究底的探索精神，以至个人的经历、语言风格，都必然使他的论述唯物史观的著作带有自己的特色。但唯物史观并不是源自马克思的头脑，而是时代的产物。对唯物史观产生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历史本身，而不是个人。

恩格斯晚年在同符·博尔吉乌斯讨论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关系时认为，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对于唯物史观的创立来说同样如此。恩格斯说：“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



史学家就证明，已经有人力求做到这一点，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做到这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将被发现。”^① 梅林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服从于它自己所制定的那个历史运动规律。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较早的时代，它是不会被任何最有天才的头脑凭空想出来的。只有达到一定高度时，人类历史才能揭开它自己的秘密。”^②

当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各个国家，特别是生产发达的毗邻地区之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是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已经超出了德国一个国家的范围，是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那唯物史观更是如此。唯物史观和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它不仅是德国的产物，而且是包括英国、法国在内的欧洲许多国家的共同产物。资本主义时代所特有的矛盾的激化，是唯物史观产生的宏观环境。

资本主义时代有两个重大事件，从经济上说是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它的转折点是 1825 年；从政治上说是从 1789 年开始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它的转折点是 1830 年。

从 18 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发明了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逐步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操作，以机器生产的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恩格斯把工业革命称为“狂飙时期”，他说：“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③

工业革命并不是英国出现的偶然现象，而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它或迟或早地以各种方式发生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阿尔温·托夫勒把它描述为一种“浪潮”——第二次浪潮。确实，工业革命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它摧毁了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创造了新的生产方式，改变了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并冲击了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为唯物辩证地考察历史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规模狭小，限制了人们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 版，第 4 卷，50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 [德]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 版，第 3 卷，30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眼界。而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不同，它不仅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使各个生产部门联系成为一个整体，显示了生产的社会性，而且形成了世界市场。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密切了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生产规模的扩展也伴随着眼界的扩展，人们有可能超出地区的狭隘性、民族的狭隘性，从宏观角度对各国的经济、历史、文化进行比较性的探讨。

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发展缓慢。生产者的全部技能和生活源泉集中在自己的“手”上，集中在自己的劳动“经验”上，生产工具的变革会使他们丧失原有的劳动技能和经验，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是他们生存的首要条件。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竞争以铁的规律迫使他们运用科学，改进生产工具，否则无法生存。“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①因此在小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心理状态是害怕变化，容易产生凝固、守旧、崇尚传统的思维方式，而在大工业急剧变化中形成的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则相反。

在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经济同它的政治和阶级斗争之间的联系，既隐蔽又混乱，为一些中间环节所掩盖。以法律形式规定的地位等级区分掩盖了阶级划分的实质；宗教的、伦理的动机往往遮住了政治斗争的经济实质。而在以大工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这种联系简单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原来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在这里，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非常明显地围绕经济利益展开的，政治权利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社会意识，以最卑陋的、粗糙的、赤裸裸的形式，每时每刻都迫使人们感受到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关键地位。

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不同于以往生产方式的特点，但它的显露是一个过程。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并处于统治地位之后，才使原来潜伏的矛盾发展为强烈的对立。1825年爆发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其惊人的外在表现，引导人们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1卷，2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危机，它震动了整个英国。当时英国的许多报刊，如《泰晤士报》、《绅士杂志》、《年鉴》都竞相报道了这次危机：威廉斯银行倒闭，伦敦几家商号——伊韦雷特·沃克公司、西克斯·史奈斯公司倒闭，“各式各样的人纷纷提取存款”，“战战兢兢地等候新的破产消息”；它们报道了工人失业加剧，无数台纺织机停止运转，“目前的失业和贫困现象是最近三十年来所没有过的”，“景况凄惨万分，穷人濒于饿死，各阶层居民都苦于时运不济”；它们还报道了“忍饥挨饿的失业工人被逼得走投无路，以致爆发了公开的暴动”。当时在布拉克本、阿克林顿、普雷斯顿、克利瑟罗、罗奇德耳、曼彻斯特、布腊德弗德、约克郡都发生了骚乱和暴动。^①

如果说1825年是经济的转折点，那1830年则是政治的转折点。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的。梅林在《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中说：“从1830年起，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捩点，出现了近代无产阶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②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1830年是个转折点，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由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转折点。从1789年到1830年7月，法国资产阶级经历了革命、复辟、革命的曲折过程，最终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从此以后开始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直接搏斗的阶段。

法国工人阶级曾经积极参加推翻波旁王朝的斗争，但胜利果实为资产阶级所独占。工人没有获得实际利益，处境日益恶化，引起工人的普遍不满。著名的匈牙利作曲家菲列涅茨·李斯特曾在一封信里描绘过他到里昂的亲身感受。他说：“一到里昂就陷入一种骇人听闻的苦难和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环境之中，使我非常激动，深感世道不公，心里充满了无法形容的悲痛”；“老年人不得安宁，青年人毫无希望，儿童也没有一点欢乐！大家一同都挤在臭气熏天的贫民窟内”；“连从未见到母亲嘴角上挂过笑容的孩子们也要俯身在织机上操作，用浑浊的目光注视着他们手指下现出供达官贵人的仔崽们玩赏的阿拉伯式图案或花纹”^③。里昂工人终于在1831年11月和1834年4月，两次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参加的不仅有织工，还

^① 参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一卷，3~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② 同上书，27页。

^③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一卷，27页。



有泥瓦工、细木工、皮鞋匠、印花工等。里昂工人起义宣告了第三等级时代的结束，无产阶级不再是反对自己敌人的敌人，而是和昔日的盟友战斗。

里昂工人起义失败后不久，英国工人掀起了宪章运动；德国工人发生了西里西亚起义。这是欧洲无产阶级觉醒的标志，无产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大踏步地登上斗争舞台。

恩格斯非常重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把它看成是唯物史观产生的决定性条件。他说：“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①

成熟的理论同成熟的阶级关系是相适应的，这条原则对于历史观同样是适用的。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并展开激烈斗争，当英国、法国工人走上街头奋起反对资产阶级，这不仅揭穿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是一种谎言，而且也标志着以唯心史观为指导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幻灭。不理解物质利益，不理解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否认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唯心史观，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现实是矛盾的。正因为这样，“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②，结果导致唯物史观的发现。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在19世纪40年代发现不是偶然的，它和1825年出现的经济危机、1830年出现的阶级斗争新局面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把这种时代条件看成是唯物史观产生的宏观环境，那德国莱茵地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阶级矛盾激化是中观环境，而马克思的家庭情况和周围环境，则是微观环境。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时代条件。

但要真正理解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条件，仅仅叙述历史背景是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3卷，65、66页。



不够的，还必须把握马克思是如何适应时代要求的。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理解了历史，他真正把握了时代，反映了无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把客观历史自身所蕴涵的可能性，变成对历史的科学意识。黑格尔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揭示了哲学和时代的关系。他说：“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③

唯物史观同它的历史条件之间的联系不是简单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它们之间联系的机制是复杂的。仅靠感官的接触，是不可能唯物辩证地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的。要真正把握历史过程的本质和动因，把握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必须深入到社会内部进行分析、解剖、研究。这是一种艰巨的科学劳动。没有动力，没有激情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尽管贫病交加，备受迫害，但以“入地狱”的精神执著地探索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应该重视科学研究的主体在创立理论中的作用，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没有马克思就没有唯物史观。动力来自哪里？来自历史条件本身，来自每个时代所特有的尖锐矛盾。这种矛盾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问题，即时代要求。马克思的天才之处在于，他面对现实，敏锐地抓住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并给予了科学的回答。问题——时代的矛盾；动机——解决矛盾的主观意图；科学答案的谜底——存在于时代本身。问题自身都蕴涵着对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研究。所以唯物史观产生的客观条件是时代，它是马克思自觉地适应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透过发展到一定高度的资本主义外在化的矛盾对历史规律的理论意识。或者套用黑格尔的话说，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的它的时代。

三

时代以其自身的矛盾迫使人们注意，并规定人们认识可能达到的范围和界限，但它不能自发地产生任何理论。理论创造是精神生产，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其中一条重要的规律是，任何理论思维

^③ [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